

客觀的「學問」與引導國民對國家、民族的基本「信念」之間，天平愈來愈傾向「信念」，故《國史大綱》一開始即強調，「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一)

從錢氏治學的軌跡看，一九二八年、一九三一年以後明顯轉向史學，一九三七年以後，先則轉向通史式的，帶有通論色彩的大敘述，後來則因感到民族心靈之空虛而更深地轉向心性義理之學的闡述。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抗戰時期，他刻意要提出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中之特殊性，至此，錢氏似已脫離舊轍，要以一個新的體系來對抗新文化運動以來的體系。決裂之後的錢穆，再度成為荒野中的英雄，他逐漸脫離考證，轉向心性義理之學，轉向歷史文化的大論述，希望從傳統歷史文化中尋得一種通解，並為現實指出一個確當的方向。

本文根據我二〇〇五年在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的公開演講稿發展而成；原發表於《燕京學報》，新二一期（二〇〇六年十一月），頁二五三—二八七。



【一】錢穆：《國史大綱》，頁一。

重訪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是一個非常光輝的學術領域，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胡適（一八九一—一九六二）、錢穆（一八九五—一九九〇）都曾圍繞這個主題，做了各式各樣引人入勝的研究。這使我想起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在〈歷史哲學論綱〉一文中，借用了保羅·克利（Paul Klee）的一幅畫「新天使」（Angle Novus）闡釋他對歷史的看法：「歷史天使的臉望向過去，身體前進到未來。」^[1]當然，歷史書寫中存在着相對穩定的部分，但我們卻不能不承認，歷史研究確實帶有班雅明所說的這個特色：每一代人「身體前進到未來」時，他們對所講的過去選材敘述並不一定相同。如清代嘉慶年間形成的《儒林傳稿》，其中所選的人物與近百年學者所關注的就有許多不同，在當時的標準中被認為是最精彩、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高愈、謝文游、應搗謙、嚴衍、潘天成、曹本榮、薛鳳祚、陳厚耀、沈彤、朱鶴齡、劉源淥、范鎬鼎、徐文靖、李光波、孔興燮。^[2]但這些學者大多不再出現在後來的學術史中，或是不再被當成那麼重要的學術人物了。

晚清思潮動盪甚大，外國思想資源湧入，內在社會政治環境的大變等，都使得「新天使」的臉所看到的近三百年思想有所變化。特別是經過晚清的變法、革命思潮洗禮之後，學者所關注的重點及人物，每每與先前有所不同，而這一波又一波的衝擊與「近三百年學術史」這個學域的形成是有密切關係的。以《國粹學報》、《國粹叢書》為例，當時至少有幾種現實關懷深刻地影響到「國粹運動」的參與者對近三百年思想學術的取舍。他們重視的是：一、與「君學」



相反的「民學」，重視「細民」、「下」的思想。二、批判專制制度，以及與它關係密切的「利祿之學」。三、強調比較接近現代科學精神的「客觀徵實」之學。四、重視任何能與近代西方民主思想合拍的傳統思想質素，其中有些是帶有創新性、異端性、解放性的。五、帶有與西方近代功利主義意味的思想家。六、關注經世致用議題者。

在這些新標準之下，被突出的是李贄（一五二七—一六〇二）、顧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黃宗羲（一六一〇—一六九五）、王夫之（一六一九—一六九二）、顏元（一八六〇—一六九五）、李燾（一六一九—一六九二）、戴震（一七二四—一七七七）、章學誠（一七三三—一八〇一）、汪中（一七四五—一七九四）、包世臣（一七七五—一八五五）等人物。即使在刊刻書籍時，背後也每每有上面提到的關懷。譬如鄧實（一八七七—一九五二）在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原善》合刻本的跋語中說：「其解理字也，以為理出於欲，情

【1】 Walter Benjamin, Hannah Arendt ed., *Illumination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7), p.257. 中譯參考班雅明：〈歷史哲學論綱〉，收入漢娜·鄂蘭特編，張旭東等譯：《啟迪：本雅明文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二〇〇八），頁二七〇。

【2】 阮元（一七六四—一八四九）：《儒林傳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第五三七冊，頁六二〇—六二一。

得其平，是為循理，與西國民主之制公好惡於民，而倡人類平等之說相合。」^{〔二〕}劉師培（一八八四—一九一九）跋包世臣《說儲》云：「其說多出於崑山顧氏，行之于今，頗與泰西憲政之制相合。」^{〔三〕}鄧實也認為《湖隱外史》「一書實可稱為「民史」，「世每謂中國無民史，此非其一邪。」^{〔三〕}又認為鄧牧（一二四七—一三〇六）的《伯牙琴》：「黃梨洲著《明夷待訪錄》，其〈原君〉、〈原臣〉二篇，斥君權，排專制，為千古之創議，然其說原出于先生〈君道〉、〈吏道〉二篇」^{〔四〕}，都是這方面的例子。

我們可以說，在形成「近三百年學術史」的系譜時，晚清以來的時局與思潮起了重要的作用，人們做了很多篩選，使得他們筆下清代儒者「全神堂」的人物與地位大幅改變了。

一、「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領域的形成

對於「近三百年學術史」這個領域有過影響的人物很多，章太炎（一八六九—一九三六）、劉師培等都是，但就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而論，起比較直接影響作用的是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以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梁啟超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曾分期刊於《新民叢報》，他認為清儒饒有科學的精神。在這個階段，胡適顯然受到梁啟超啟發，故跟著主張清儒體現科學精神。^{〔五〕}但是即使在這個階



段，梁啟超對清代學術的看法也有多面性。梁啟超一方面說清儒「饒有科學精神」，同時也說「本朝考據學之支離破碎，汨歿性靈，此吾儕十年來所排斥不遺餘力者也」。^{〔六〕}

這與梁氏的學術傾向有關。梁啟超早年對於學術的態度比較傾向其師康有為，強調今文經學和宋明理學，尤其是王陽明這一脈。所以，他一方面肯定清儒的治學方法，但同時也痛罵清代二百年來之學問「皆牛鬼蛇神」。^{〔七〕}可是在新文化運動後，因胡適（一八九一—一九六二）提倡以科學精神「整理國故」，並得到四方景從，梁氏也隨即跟上。胡適在一九二一年五月的日記中評論《清代學術概論》說：「此次付印，另加惠棟一章，戴氏後學一章，章炳麟一章，

〔一〕 鄧實：〈《孟子字義疏證》《原善》合刻引〉，轉引自王波編：《鄧實集》（出版中）。

〔二〕 劉師培：〈《說儲》跋〉，收入《小倦游閣集·說儲》（合肥：黃山書社，一九九一），頁一九九。

〔三〕 鄧實：〈《湖隱外史》跋〉，轉引自葉紹袁原編、費勤輯校：《午夢堂集》（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八），下，頁一〇八〇。

〔四〕 鄧實：〈鄧牧心《伯牙琴集》跋〉，《國粹學報》，第三年一一號（總第三六期），一九〇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頁六。

〔五〕 胡適在《四十自述》中反覆強調自己早年受到梁啟超很大的影響。見胡適：《四十自述》（臺北：遠東圖書公司，一九五九），頁五〇—五四。

〔六〕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臺北：中華書局，一九七七），頁八七。

〔七〕 梁啟超：《新民說》（臺北：中華書局，一九七八），頁一二六。

此原稿所無。此外，如毛西河一節，略有褒辭，袁枚一節全刪，姚際恆與崔適的加入，皆是我的意見。」^[1]一九二二年十二月，胡適在日記中又認為梁啟超在一九二〇年出版《清代學術概論》是受其影響，他說：「其實任公對於清代學術的見解，本沒有定見。他在〈論私德〉篇中，痛詆漢學，有云：『夫宋明之學，曷嘗無缺點之可指摘？顧吾獨不許鹵莽滅裂之漢學家容其喙也。彼漢學則何所謂學？……吾見夫本朝二百年來學者之所學，皆牛鬼蛇神類耳！』……任公編集時，不刪此文，而獨刪去《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之第八章。近來因為我們把漢學抬出來，他就也引他那已刪之文來自誇了。」^[2]也就是說胡適先受到梁啟超的啟發，後來梁啟超這一個本來視清代考證學為「牛鬼蛇神」的人，反過來受胡適的影響，寫成《清代學術概論》，並開課講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3]

在五四運動之後，「以科學整理國故」之風大暢，「歷史的天使」身體到了五四，但他面向過去的臉，所看到的是不大一樣的场景。此時一批不同的學術人物登上舞台，從胡適與梁啟超的書中便能看出這一點。梁啟超強調經世致用，現實的、實踐的，所以顏元（一六三五—一七〇四）、李塉（一六五九—一七三三）出現在他的視野之內；他強調與西方民主自由比較相近的價值，所以黃宗羲等人也在內。又因為強調科學精神，故講王錫闡（一六二八—一六八二）、梅文鼎（一六三三—一七二一），以及比較重視客觀精神考證文獻的胡渭（一六三三—一七一四）、閻若璩（一六三六—一七〇四）等人，尤其是在《中國近三百年學



術史》中用了四章的篇幅講〈清代學整理舊學之總成績〉。

二、梁啟超與錢穆

一九三一年，錢穆先生在北大歷史系任教，是在大學講授歷史課程之開始，依錢先生回憶，他所開授的課，一為中國上古史，一為秦漢史，皆是由學校所指定的必修課，另一門選修課由他自定，決定開「近三百年學術史」。他說：「此一課程，梁任公曾在清華研究所已開過，其講義余曾在雜誌上讀之，任公卒後，某書肆印此書，梁家以此書乃任公未定稿，版權所屬，不准書肆發行。」後來他終於在北京的東安市場的非正式管道中買到一部，「余因與任公意見

【一】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二〇〇四），第三冊，頁一八。

【二】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三冊，頁四三三—四三四。

【三】吳稚暉（一八六五—一九五三）便觀察到梁啟超反過來受到胡適影響，他在〈歲洋八股化之理學〉中講梁啟超：「受了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影響，忽發整理國故的興會。先做什麼《清代學術概論》，什麼《中國歷史研究法》，都還要得。」見吳敬恆：《吳敬恆選集（哲學）》（臺北：文星書店，一九六七），頁一三三。

相異，故新開此課程，自編講義。」^{〔一〕}錢穆對梁啟超書中反覆強調的兩個重點並不同意：第一點是清學是對宋明理學的反動，第二、清學是客觀徵實之學，近於科學。^{〔二〕}錢穆說：「余本好宋明理學家言，而不喜清代乾嘉諸儒之為學。及余在大學任教，專談學術，少涉人事，幾乎絕無宋明書院精神。人又疑余喜治乾嘉學，則又一無可奈何之事矣。」^{〔三〕}所以，錢穆的這本書雖然承繼了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題目，但它的宗旨其實是有出入的。借用余英時先生的話說，錢穆在動手撰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時便已將「體」或「框架」確立下來。^{〔四〕}在「體」確認下來之後，錢穆所選取的人物與思想潮流便與梁啟超有所不同。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的第一部分是對明末清初大儒的闡發：黃宗羲（二六一〇—一六九五）、顧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閻若璩、王船山（一六一九—一六九二）、朱舜水（一六〇〇—一六八二）。接下來是史學：萬斯同（一六三八—一七〇二）、全祖望（一六六八—一七四一）；程朱學派：張履祥（一六一一—一六七四）、陸世儀（二六一—一六七二）、陸隴其（二六三〇—一六九二）、王懋竑（二六六八—一七四一）；實踐主義：顏元、李塨；科學之曙光：王錫闡、梅文鼎。這些安排有兩個重點，即清學是「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向於客觀的考察」，「排斥理論提倡實踐」。梁任公書的第個二主體是「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第一三至二六章），這個部分應該是受到「整理國故運動」的影響，故以科學的客觀精神為主體，一方面說清代學術為科學的，一方面突出清代學者整理舊學的成



績。從目前梁書的樣子看，錢穆云：「梁家以此書乃任公未定稿」，恐怕是事實。^{〔五〕}方諸於《清代學術概論》，後者主旨明確，線索貫串，一氣呵成，則《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顯然並未完全定稿。

與梁書相比，錢書有一些不同的安排。書中的安排、取材、所選人物雖與梁啟超有所重疊，但是重點卻有不同。他的整個主脈是清學與宋明理學的發展是不可切斷的，它對宋明理學

〔一〕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臺北：東大圖書公司，一九八六），頁一四一。按：錢先生此處回憶有所出入。梁任公於一九二三年九月間於清華學校講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課程，其時清華尚未設立大學部與研究院；一九二六年七月上海民志書局出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尚在任公生前。參看趙燦鵬：《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成書問題辨析》，《社會科學研究》，二〇一五年第四期，頁一八八—一九一。

〔二〕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臺北：中華書局，一九八七）中揭「反動說」：「『清代思潮』果為何物耶，簡單言之，則對於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而以『復古』為其職志者也。其動機及其內容，皆與『文藝復興』絕相類。」（頁三）又說：「一言以蔽之，曰用科學的研究法而已，試細讀王氏父子之著述，最表現此等精神。」（頁三三）

〔三〕 錢穆：《師友雜憶》，頁一三七。

〔四〕 余英時先生為《國史大綱》寫的導論，見《〈國史大綱〉發微——從內在結構到外在影響》，《古今論衡》，第二九期（二〇一六年十二月），頁四—一六。

〔五〕 錢穆：《師友雜憶》，頁一四一。楊樹達（一八八五—一九五六）在日記中也提到一九三〇年，他接受林志鈞之託檢校此書，似可說明其為未定之稿。見氏著：《積微翁回憶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頁五三—五四。

有修正、有反動，但更有抹不掉的底色，如錢穆自己說：「余本好宋明理學家言，而不喜清代乾嘉諸儒之為學」。^{【一】}故錢穆反對梁任公近三百年學術史一開始的標題「反動與先驅」。用余英時先生在〈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中所說的，「反動論」好像認為「反」即可以「反」出一部清代學術史來。^{【二】}另外，錢穆對梁氏所說的清儒「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向於客觀的觀察」，也並不完全同意。這裡的「主觀冥想」顯然是指宋明理學，而他認為如果說「厭倦」宋明理學是啟動清學最主要的動力，顯然不合乎史實。梁啟超認為，清學與宋學不大有關係，錢穆則注意到，即使在考證學最盛時，清代理學仍有其活力，應當正面陳述。尤其在晚清，宋代理學之流行及復興發揮很大的現實作用。

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引論〉中是這樣說的：「治近代學術者當何自始？曰：必始於宋。何以當始於宋？曰：近世揭糞漢學之名以與宋學敵，不知宋學，則無以平漢宋之是非。且言漢學淵源者，必溯諸晚明諸遺老，然其時如夏峯、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菴、習齋，一世魁儒耆碩，靡不寢饋於宋學。繼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謝山乃至慎修諸人，皆於宋學有甚深契詣。而時已及乾隆。漢學之名，始稍稍起。」^{【三】}接着，他從唐宋一路講下來，講清學開山三大儒——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此後在講清代中晚期思想時，也指理學在當時像是泡在水中的咖啡，雖然看不到咖啡粉，但時時可見其色彩。此外，在處理清代的樸學時，錢穆認為他們不只是在「整理」舊學，還有思想的面向。



可能因為上述的傾向，所以錢穆撰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時，在有意無意之間也產生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即他的書雖以「學術史」為名，但多講思想，且對若干清代考據學大家像王念孫之流竟而完全未加著墨。

三、彷彿尋寶之歷程

我個人在閱讀《師友雜憶》與《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撰寫過程中有關的段落時，常常有一種興奮感，即這是一個觀點不斷翻新與史料不斷擴充的過程，每每受其牽引，彷彿參與尋寶的過程。錢穆回憶說，當時的北平一如書海，在以科學整理國故的運動之後，於新學術觀點的燭照之下，若干歷史人物受到人們前所未有的重視，搜羅罕見文本的風氣很盛。《師友

【一】錢穆：《師友雜憶》，頁一三七。錢穆在《宋明理學概述》的〈序〉中有一段話扼要地講述其對宋學、清學態度的發展：「宋明之語錄、清代之考據，為姚、曾古文者率加鄙薄，余初亦鄙薄之，久乃深好之。所讀書益多，遂知治史學」，「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見氏著：《宋明理學概述》（臺北：學生書局，一九七七），頁二。

【二】余英時：《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收入氏著：《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七六），頁一二五—一二六。

【三】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六六），頁一。

雜憶》中所提到的，舉凡陳確（二六〇四—一六七七）的《大學辨》、潘平格（一六一〇—一六七七）的《求仁錄》、《章實齋遺書》家傳本及戴震的《孟子私淑錄》、顧祖禹（一六三一—一六九二）《讀史方輿紀要》嘉慶刊本、雷學淇《竹書紀年義證》、《三朝北盟會編》半部鈔本等^{〔一〕}，其得書經過莫不動人心弦，後人讀來宛如閱讀偵探小說。所以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雖不特別提倡新得史料，但史料的擴充卻是此書的一個重要特質。以潘平格的《求仁錄》一書為例，梁啟超只能從唐鑑（一七七六—一八六一）《清學案小識》的引文中轉引，而錢穆已能讀到原書，兩者之間便有莫大的差異。正因為材料獲得的難易程度不同，故梁啟超書中對《求仁錄》只是一筆帶過，而錢穆就認為《求仁錄》跟理學、心學的發展以及清初的思想界有很重要的關係。

在鋪陳內容時，錢穆似乎比較少用外部評斷的視角，而多是平心靜氣地涵泳原典，並將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做一番鉤玄提要的功夫作為引文，使得讀者披覽之後，可以把握到一家思想之要旨。同時，他也把可進一步發掘的問題放入雙行夾注中。在多次披覽之後，我感覺到書中涉及了許多曲折的學術問題，對於這些問題，錢穆都曾仔細思考過才行諸文字，故用語特別簡當，而指涉卻相當深遠。所以我覺得凡閱讀這一部書的讀者，應該採取「循環往復」的態度，也就是先通讀一遍，從事某種專題的研究之後，再回去仔細玩味《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相關的章節或段落。



在這裡隨舉一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十二章「曾滌生」中有一段話說：「清儒考證之學，盛起於吳、皖，而流行於全國，獨湖、湘之間被其風最稀。」^{〔二〕}大多數人在讀《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這一章時，對這幾句話很可能會一閱而過，可是如果比較集中地研究清代湖湘地區的思想、學術之後，便會發現在清代考證學勢力如日中天之時，各大區域之間有一個「重心轉移」的進程。如果將當時考證學的圈子分成三級，則第一級地區以江蘇、浙江、安徽為主，第二級以山東、河南、河北、山西為主，第三級則是後來的福建、廣西等地。而湖南、湖北在考證學盛時，幾乎沒有什麼代表性人物。如果翻查《皇清經解》與參考《皇清經解提要》等書，可以發現清代經學名人中，就很少或幾乎找不到湖南、湖北的學者。^{〔三〕}再看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六章〈清代經學之建設〉所列的幾個表：「亭林學友表」、「初期經學家表」，亦無一湖北人，且幾乎沒有湖南人。經此一番探究，則知：「清儒考證之學，盛起於吳、皖，而流行於全國，獨湖、湘之間被其風最稀」一段所指為何了。但道咸之後，學風大變，湖、湘成為新思想的發源地，湖南唐鑑等人在北京所形成的理學團體，對後來歷史的發展佔有

〔一〕 錢穆：《師友雜憶》，頁一四二、一六〇—一六五。

〔二〕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五七五。

〔三〕 沈懷撰、趙燦鵬校注：《皇清經解提要》（北京：華夏出版社，二〇一四）。

關鍵性的地位。

此外，我覺得錢穆對重要思想家言論的把握，以及他們如何影響時人及他們與論敵之間觀點的出入，也是書中討論的核心。這是受傳統學案的影響，所以他的書也是採學案式、綱目體的寫法。因為錢穆對傳統古籍掌握深入，且非常用心體會，所以在上述幾方面都寫得非常好。但作為一個後代讀者，我比較注意的是：受他人影響的人，在被影響的同時，其實對他自己而言，也是一次擴充與創造。所以，我覺得錢穆在講影響時，比較忽略了被影響的人本身其實也在主動擴充、創造自己。

四、清代學術史的「史料革命」

前面提到，在讀《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時，讀者處處感到一種史料「出土」的興奮與趣味，但近年以來，隨着清代文獻大出，尤其是幾部大型材料書的出現，如《四庫存目叢書》、《四庫禁燬叢書》、《四庫未收書輯刊》、《清代詩文集彙編》、《稀見清代四部叢刊》、《晚清四部叢刊》、《民國學術叢刊》等，乃至於各種電子文獻資料庫，使許多原先只能在圖書館抄錄的罕見書以及大量稿抄本，都不難寓目，造成了另一種形式的明清「史料革命」。

以潘平格《求仁錄》為例，前面提到，當梁啟超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時，尚未能見



到《求仁錄》原書，故只能從唐鑑的《清學案小識》中轉引，而錢穆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時，則因偶然機緣得以直接讀到《求仁錄》。但是在《四庫存目叢書》中，則有卷帙更富的本子。《四庫存目叢書》中的《求仁錄輯要》共有十卷，而錢書中摘述的只有第一、二卷。錢先生可能因為只見《求仁錄》第一、第二卷，故書中的闡發仍然有限，在辨清學脈方面，所重視的多在「破」的一面，忽略其「立」的一面，故對於潘氏如何建立一套積極救世哲學，使得原來有關個人修養的材料，多變成治國平天下的概念，突然具有新的意義，顯然未多加注意。^{【二】}

關於史料限制這一點，此處再以清初的汪紱與江永為例。汪、江二人是同一時代、同一地域的朱子學代表人物。《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提到清代徽歙間講學淵源，遠自無錫之東林有汪知默、陳二典、汪佑、吳曰慎、施璜講朱子之學於紫陽書院，又因汪學聖問學於東林之高世泰，實為徽州朱學正流，江永、汪紱皆為其餘波。「故江浙之間學者多從姚江出，而皖南則一遵舊統，以述朱為正。惟汪（紱）尚義解，其後少傳人，江（永）尚考覈，而其學遂大」。^{【三】}錢穆在這一段的雙行夾注中說：「汪雙池年譜有與江慎修書三通，及江覆書兩首，可證兩家治

【一】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二〇四。
【二】 同上，頁三〇九—三一〇。

學之歧趨。」^{〔一〕}錢先生非常敏感地點出，汪、江論學不合。他們兩人往復爭論的這幾封書信，即收在《善餘堂文集》中。^{〔二〕}我直覺以為江、汪這件公案，錢先生把握非常真切，不過錢先生似未讀過卷帙浩繁的《汪雙池遺書》，故講到汪氏的部分比較簡略。這部遺書收藏的地方不多，但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即有一部二十八種本，可供進一步考索。^{〔三〕}

以上兩個例子是為了說明，在這個「史料革命」之下，對於重估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可以產生莫大的作用。我曾與學生一起將《清代詩文集彙編》等叢書中的稀見之書標出，其數目達到一個難以想像的比例，這一情形幾乎出現在前述的每一部大型叢刊中，值得我們注意。

五、餘論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是一部八十多年的書了，在這麼長的時間內，思想史的寫法已有相當大的變化。

至今為止思想史的寫作方式中有比較明顯的兩派，一是個人派，一是思潮派。前者著重個人及授受源流，認為個別思想家可以產生重大的思想或現實影響，後者則比較重視整體思潮的變化。錢穆似乎比較屬於前者，而這也是從兩部《學案》，或《儒林宗派》等方面以來的傳統。後



來的學術史或思想史，則偏向寫一片又一片的思想場景，一次又一次的思潮變化，個別人物在其中地位，但不單只是孤獨地站立在舞台上，這也使得思想史或學術史的解釋變得更為複雜。

此外，我個人認為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解釋是複調的，是兩個以上色彩的學術史發展，而梁啟超受到科學整理國故運動之風潮的影響，比較從單一方向去綜理清代學術。最近一、二十年來，人們比較不那麼堅持認為晚清以來思想殿堂只有一個基調，而那個基調是科學的、客觀的、革命的，所以學術界回過頭去重看近三百年學術思想時，可以有一些新的方向與解釋。在這個時候重新閱讀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相信讀者可能會產生不同的領會。

錢穆對「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這個題目，是不斷思考發展的。抗戰期間，他受託重編《清儒學案》，其書雖已遺失，但有〈序目〉留存，或可略窺錢穆對清代代理學發展之看法。此外，賀麟在《當代中國哲學》中批評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未有章太炎一章，當時章太炎雖仍在世，但其學問卻已可蓋棺論定。後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第八冊便收錄多篇有關清代學術思想的論述，其中包括〈太炎論學述〉。

〔一〕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三〇〇。

〔二〕 林勝彩點校、鍾彩鈞校訂：《善餘堂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二〇一三）。

〔三〕 另有浙刻《雙池遺書》八種，光緒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刊，較多見收藏。

最後，我要再度以「新天使」來說明，讀者與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關係。不同時期的學者從各種不同角度閱讀錢書時，彷彿是新天使移動的腳步。譬如楊樹達日記裡說：「閱錢賓四（穆）《近三百年學術史》。『注重實踐』，『嚴夷夏之防』，所見甚正。文亦足達其所見，佳書也。」^{〔一〕}錢書在抗戰前夕寫成，日本入侵之勢已在眼前。楊樹達讀此書時在一九四三年，此時「歷史天使」的身體前進到了對日戰爭，但他的臉望向過去、望向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時，所看到的重點是「注重實踐」、「嚴夷夏之防」，與之前之後的讀者有所不同。我個人相信未來不同時代的讀者，也都將在這本書中看出不同的重點與意義來。

本文原為臺灣商務印書館新版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所撰寫之〈導論〉。



〔一〕 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頁八二。余英時先生引此條並評論說：「楊樹達特別指出『文亦足達其所見』這一點，是有眼光的，因為錢先生在此書中每寫一家必儘量揣摩其文體、文氣而仿效之，所以引文與行文之間往往如一氣呵成，不着剪接之迹，但讀者若不留意或對文字缺乏敏感，則往往不易看得出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特『嚴夷夏之防』，正是因為這部書在抗戰前夕寫成的。這時中國又面臨另一次『亡國』的危機。」見余英時，〈一生為故國招魂〉，收入氏著：《猶記風吹水上鱗》（臺北：三民書局，一九九一），頁二六。此外，也有學者認為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遠遠不如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見汪榮祖，〈錢穆論清學史評述〉，《臺大歷史學報》第二六期（二〇〇〇年二月），頁九九—一一九。

近代史家的研究風格與內在緊張